

〔美〕艾恺 Guy S. Little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
论文化守成主义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许医农
装帧设计 曹琼德
版面设计 黄筑荣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论文化守成主义

[美]艾 恺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76 千字

印数:5001—13000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 - 221 - 02229 - 1/B·42 定价:11.80 元

代 序

——艾恺先生其人

我第一次见到艾恺(Guy S. Alitto)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当我来到芝加哥大学的一幢哥德式建筑物里,我见到了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指导老师的艾恺先生。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外国人”。

按照礼节,我们彼此用英语寒暄了几句,然后开始谈到了中国、东方、世界……当话题转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时,艾恺先生拿出了一本中文书稿让我一阅。我看着书稿封面上的中文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以为这是他的英文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于是问道:“这么快就有了中文本了,是谁翻的?”艾恺先生答曰:“可惜呵,就是没有翻译本,因为我实在太忙,没空翻译。”我对着眼前的中文书稿大惑不解地说:“这不是已翻成中文了吗?”艾恺先生的回答是我想象不到的:“这不是中文译本,这是我用中文写成的著作,我是说我还没来得及把它译成英文。”就这一番话顿时使我对这位“留着小胡子的外国人”肃然起敬了。

艾恺先生出生于美国,毕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成就卓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艾恺先生去哈佛大学从师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史华慈。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0年哈佛大学聘请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孔菲力教授去接替刚退休的费正清教授,于是艾恺先生被芝加哥大学从哈佛请去。从1980年至今,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艾恺先生的成名作《梁漱溟传》(*The Last Confucian*)曾获得“费正清最佳著作奖”,并得到美国学术界权威人士和读界的普遍好评,认为此书在研究方法、立论角度和文字写作方面都非同凡响。

艾恺先生精通中文,曾一度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编委。早在他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就经常为美国国务院担任特别翻译,1972年,他曾参与接待过中国最早赴美访问的科学家代表团。他说中文时一口“京腔”,不仅用词准确,而且妙语连珠。

艾恺先生目前正在从事对山东省邹平县的历史研究。由于邹平地区是中国政府对西方学者全面开放的唯一地区,艾恺先生雄心勃勃,准备在近几年写出几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杰出著作来。

我借《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在国内出版之际,祝愿他成功。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博士候选人 张 信

前 言

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讨论;而以现代化发源地著称的英国、法国却越来越少被人提起。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人们以往的注意力焦点在于美国、日本以及亚洲的一些其他“经济成长国”,然而当前社会主义阵营里所发生的变革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心。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对这场从18世纪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变革——即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反应作一些分析。这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于:(1)从表面现象上看,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考验的过程,于是每个不同的文化都会作出自己的反应;(2)从本质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尽管在思想上对现代化的反应不同,其实质是大同小异的。

本文决意分析这种思想上的反应,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多年来,世界上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著书立说者难以数计,但大都忽略了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范围内所共有的在思想上的反应。

再者,更多的人愈加强调现代化之在科学技术上和人们物质生活上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却忽略了其在思想上所引起的消极反应,而後者的研究却往往比前者更需要被人注意和作深刻探讨。

本文所及,皆在于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现代化的过程可分成两个层次,科学技术和文化层次,在文化层次上,自最早西欧的现代化出现以来,不管在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现代化的过程都受到了批评和攻击,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批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

在讨论世界范围内在思想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消极反应这一问题之前,先要作如下的几点说明:

第一,现代化过程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然而其实质都是相去无几的。其结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如:理智化、效率化等等差不多;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如:对社会的传统礼俗、民族文化的继承等等所造成的破坏,也是大同小异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在表面的歧异之下,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所出现的“现代化过程”都存在着相类似的地方。

第二,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同现代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之兴起的所谓的“新国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从现象上看,各地区、各种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社会背景、文化渊源不同,以及各自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立论,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批评方法;然而正如他们论述的是同一个对象——现代化——一样,这些批评和观点都有着很多相类似的地方。比如:西方在对现代化的批评中所采用的二分概念等的分析方法也同样在东方被普遍采用,这正好证明了它并非是为一个社会所特有,而且也不只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

第四,在思想上对现代化过程的反映的共同性,并不抵消“现代化过程”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产生的相异性。当一些非现代化的社会同现代化的社会相对垒时,其互相间的摩擦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第五,现代化到来的必然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

I. 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则见于能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并且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强化这一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作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

II. 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中所起的成效显而易见、立竿见影,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则难以察觉。现代化真正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就拿个人的社会生活方面为例,它造成了社会的群体向个体的转变,功利观念的加强以及个人私利的计算,这一倾向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有增无减,发展趋势难以预测。

再者,个人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提高水准则如同上瘾,而难以解除欲望,套句中国俗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第六,对现代化的发展前景作任何预测都将是徒劳的。因为,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更由于,不管是什么理性的推导,在非理性的核战争中,都没有生存之余地。所以我们只能假定讨论的前提是人类的文明最终不会被核武器一类的事物彻底毁灭。如果人类文明得以永存,现代化过程与反现代化的种种思潮将并存着发展,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只能作如下的猜测:

让我借用英国 20 世纪小说家阿道斯·赫胥黎(Addous

Huxley)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绘的景象和其他人所描绘的图像——这些图像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未来社会中,技术上所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范围日益扩大,并且进而能满足人们种种非物质的要求,如宗教性的、情感性的。在生物工程学改变人类的基因与生理存在之前,其他的科技已能改变人类的“人性”存在。

如果事情果真这样,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一切不要到来,因为那种所谓的新“人性”是无法与我的血肉之躯相容的,就好像当家庭生活的需要变得由家庭业来代办时,我觉得人活在世上还不如不活。

传统与现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解消。近两百年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各种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表象。

本文由于想用一个新的架构来考察世界范围内持续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不可避免地所用的词义范畴与习惯上的用法是很不相同的,因而也造成了传达上一定的困难。不过,我相信一切不够清楚的地方都是我的责任,如不是我想得不清楚,就是我说得不清楚,希望大家指正,也希望大家批评。

最后,应说明我所谓的中国文化守成论这个概念。此词英文称之为 Cultural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 习惯上中译为“保守主义”,通常都有很重的政治含义与价值指向,和我希望指出的文化现象有出入;特别是民初的反现代化思想,其不但不保守,进取的精神反而很明显。是故我想到孙逸仙博士的名训“守成不易,创业维艰”,在这些思想家的情怀中,面对艰困的创业,一再提示国人守成的意义与不易,也是很自然的吧!

民初时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最重要事件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批评和攻击,同时提倡更深也更广地引进西方文化。这个立场和新青年杂志的一群知识分子之与五四运

动是一致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1879—1942)和胡适(1891—1962)。同时,这样的立场也和新的群众爱国运动及反对帝国主义思潮紧密相关。

在差不多同时期,和反传统主义相反对的思潮也出现了——即面对日益增强的西化力所产生的文化守成反应。主张复苏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同时坚信中国文化不但和西方文化相当,甚至还要优越。这个立场以《学衡》杂志的撰稿人如梅光迪及梁启超(其晚年)、梁漱溟、辜鸿铭、林纾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看法可称为中国的“排西派”,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界定中国文化。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一再提起过的^①,我把这种反应称做“反现代化”。所有这些人物都批评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他们提倡融合的中西文化,指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我把这种立论,称作“文化守成主义论”。其他民初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虽然不属于这一派,但他也站在类似的立场。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东西文化论争的种种特质,也不是单纯地对文化守成主义的反应本身进行研究。本文试图把这个现象抽样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背景上,来了解这个论调的真正性质。要掌握其真切的历史蕴含,只有把它和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反现代化”反应加以综合比较。也只有把它和其他国家的其他反应加以对照,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国在哪些方面具有其独特性。

^① Guy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 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California, 1979).

目 录

代 序	1
前 言	1
现代化的定义	1
作为解释性用词的“现代化”	5
启蒙运动:现代化的诞生	8
反现代化	15
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国家主义与现代化	17
德国浪漫思想与文化民族主义	21
民族国家、现代化与国家主义的关系	29
英法两国的反现代化思想家(1780—1880)	47
斯拉夫主义者	61
19 世纪末西欧的反现代化思潮	76
欧洲反现代化思想概说	82
亚洲“对西方世界的反抗”	95
印度的批评	101
中国的批评	145
日本的批评	193
非洲及中东的批评	213
当代欧美的批评	216
结论	224

现代化的定义

在对世界性的现代化进行批评描述和分析之前，逻辑上首先需要将批评对象主体——世界性现代化现象——做些解释和界定。“现代化”这个名词之作为学术探讨的用语，还是最近的事；总之在二次大战后，这个词才开始在西方通行起来。它的用法通常都是“正面的”，指的是“好的”东西。批评“现代化”的几乎从来不用这个词作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我们需要的定义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提供一个能测量现代化程度的尺度。（二）提供一个有解释力的定义，使所有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必定要发生的社会、政治、心理等等变化能够得到相当的了解。

在进行讨论现代化既存的种种定义之前，我们先得留意论及现代化的各种历史性解释所具有的共同点。下列几点几乎是所有学者都同意的：

- （1）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发生。
- （2）这个过程和其结果可以和所有社会过去既有的性质相区别，和“传统”鲜明对照，也就是“传统”有其作为和“现代”相对立（antithetical）的性质。

(3)现代化的发展和西方传统本身所含的一些因素有因果关系;是故,这个过程可回溯到西方所独有的文化与传统。现代社会学创始者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一生事业可以说都在于辨明那些方面。

(4)要辨明西方传统中的哪些方面与现代化有关是很困难的。例如韦伯,他将“现代化”(他称之为“资本主义”)溯源于“新教伦理”^①;其他人溯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有的特别点明始于牛顿派物理学;有的回溯得更早,到文艺复兴时代。

事实上,不管在西方历史的哪一点上去找现代化之源都没有差别,因为每个假定的源头在逻辑上都是肇基于早先的发展,是故,也就可以回到西方文明的“古典”时期——古希腊。没有牛顿物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有工业革命;不先有新教就不能有资本主义;而没有旧教(天主教)或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新教;没有古罗马和古希腊又哪儿来的文艺复兴呢?职是之故,根本的起源只好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去找,理由是:在那两个历史时期,“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已经有了差

①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历史发展而来,在交易关系中相互结合的营利企业之体系。但,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般相区分之处,则在于其“理智”的特质及对劳动的“理智化”组织。他辩称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兴起,受了基督教新教派(以下简称“新教”)——特别是喀尔文派——伦理兴起的影响。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最早面世时是作为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1920—1921.) 一书的第一卷第一部分。韦伯基于现代德国新教盛行地区较天主教地区富裕的这个观察,找寻成熟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的关系。他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由其内在的经济决定,且为另一发展势力——新教的宗教伦理——所推动。在比较的用语上,他把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精神”二者相提并论,声称成熟的资本主义并非建基于单纯的需索欲求,而是“理智化”的活动,强调秩序、训练及组织的阶层性,他强调是这些方面的成功,而不是经济成功可以购得的种种快乐。

异。

(5)在这些历史性的解释里,“现代化爆炸”(不管怎么界定它)的最终原因和其中包含的因果性要素都从来没有清楚辨明过。因为,尽管从西方所经验的某些方面(宗教、思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人们可以追溯出许多互相关连的原因,要把复杂的历史诸因子梳理开,再彼此联系起来以解释现代化,欲使人满意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连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好比说,没有牛顿力学的革命和资本主义阶级的兴起,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反言之,如果不是有15、16世纪的探险时代及欧洲的扩张,加上文艺复兴时代与君主集权出现时的古典学复兴,这些也都不可能发生。过去两百多年来许多应用历史的社会科学(包括新近的分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实际都持续了辨明欧洲现代转变终极原因问题的讨论。可是,要抓住现代化的精义,他们是远不足以叫人满意的。过去30年来很多学者把重点专注于离析西方(西欧和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及其他领域发展的特殊性和现代化的“精髓”或“通则”。

韦伯的分析本身即可成为一例:新教伦理显然是不必要的——最起码,就其西欧所呈现的特殊形式而言——因为,到1900年,日本验诸多重标准都无疑是个现代化国家,然而不但日本传统宗教伦理和基督教毫无相似之处,在日本的例子任何“新教式”的运动都不存在。不过,我们需要指出,日本的现代化(无论二次大战前或后)是建立在许多实际的西欧特殊模式之上的;包括了将西欧文化中分歧的因子——衣饰、家具、音乐、文学、社会习惯、工厂生产以至于经营技术等等,加以整合。

资本主义,虽说在日本这个例子上是一项明显的要素,它

的发展也和西欧所采取的模式不一样。至于在俄国，现代化发生在一个极端反资本主义的极权政权成立之后，其现代化是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虽然，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了。

作为解释性用词的“现代化”

造成欧洲转型的西方文化积极要素和原因的确实性质，不能叫人满意地加以辨明；因而，我们便还有相当的余地对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和西方经验的整体加以分离，但是所遭遇的困难还是同样的。直到二次大战及其后诸般社会科学的进展中，描绘“非西方社会”具有与“西方社会”相近似的转型，最通用的词是“西化”。虽然无可争议的，许多这些非西方社会的转型直接以西方的模式为复制的原件，这个名词是彻头彻尾的“同义反复”。好比说，如果我们指的是英法两个国家在18世纪产生的变化，我们就不能讲英国或法国“西化”了。另外一个二次大战前适用甚广，迄今仍相当重要的用以描述“非西方地区”的这种转变的名词就是“工业化”，这个词如果是意指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等方面由工业化引起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的话，它最起码可用来将转型的原则和西方的整体经验加以离析。虽然如此，这个词先天上特别着重在经济和技术学的层面上，是故，不能表达这种转型过程的高度复杂和广泛的特点。

这个词之所以被人使用,显示了直到今日研究这过程的困难。许多“现代化”的定义都被局限在整个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方面。政治学家习于专注在社会和政治变迁;而经济学家则纯就技术学在经济方面来加以界定。

理想的定义应该是全面性的:包含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中所能包括的其他方面。同时,这个定义应尽可能和西方经验的特殊面相隔离,也就是说,不能是带有“文化界际色彩”的。它应当尽可能对这种转型过程中纯粹负面的、破坏性的方面加以解释,并对正面的结果提供说明。本文的后半部将阐明:不管在西方或非西方,对这个过程持有批评态度者,无论其政治立场是左、是右,抑为自由派,在他们的批评中都倾向于专注在同样的一些负面的现象上。

我本人对于这个过程——即现代化——所下的定义应能符合上项要求。我的定义建立在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上:“擅理智”(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即对环境的控制)。“擅理智”在这里的意义最接近于“科学的”及“合理可用”。在这一意义上,理性认知是一种——假设能由一个理论上无所不知的科学观察者加以观察——不违背任何科学法则的知识。也就是说,它和最科学的思考相合一致。“理智”指的是为达到实际目标而进行的对最有效手段的选择。“擅理智”是指一个过程,在其间,一个结构或过程变向运用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经验性的目标。“役自然”是指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现代化”由是可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征服自然本身并不一定是达到人类道德性目标的手段。而我这个定义与人类最终诸种价值(人性的目标)也是不相关连的。擅理智和役自然都是“手段”。实际上,现代化对任何事物惟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也就是说,任

何社会政治、经济的过程，其制度与组织及理智的创造等等的“好”还是“坏”，其终究价值在于其擅理智的功利性和效率。历史产生的各种制度、组织等——也就是“传统的”——相对于近两百年来人类对环境空前的控制，为了迎合快速改变的需要，所谓“传统”如果不是被理智化了就是被淘汰了。

虽说这个定义是不拘于某一文化的——由于它基于完全客观、普遍及可以用经验验证的尺度——它着重的还是过程，而非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程度。有没有什么绝对的尺度来衡量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呢？我们把“非动物性能源与动物性能源的使用比例”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